

# 第一章 寻梦别“左”

## 一、粉碎“四人帮”后的忧思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迈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坚实的步伐，不过迈出这一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了粉碎“四人帮”之后长达两年之久的曲折和斗争。也就是说，伟大转折的实现就是一个艰难的摆脱“左”倾磨难的历程。

1976 年是个不寻常的龙年。岁末当龙的传人们送走这个“图腾”崇拜的始祖之后，才惊讶地发现，这一年它给中国带来的灾祸实在是太多、太大、太凶了！

这一年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相继逝世；初春吉林下了陨石雨；7 月煤城唐山发生了 7.8 级大地震，死亡多达几十万人。这个龙年，开始给人们带来的确是大悲、大痛。然而，大自然并不总是按照某一特定的方向线性地发展。社会历史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那样表情多变，忽而大凶、忽而就是大吉。否极泰来，大概这也就是它的辩证法。

几位伟人的逝世，给多灾的中国政局又增加了几许冰霜。面对权力金字塔顶层的“虚位”，一直窥视篡党夺权时机的“四人帮”，这时便按捺不住内心的焦虑，开始纷纷出洞抢班夺权。

早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四人帮”就已开始蠢蠢欲动。1976年8月，他们就已着手武装他们的帮派工具，给上海工人民兵指挥部突击下发各种枪支 74000 多支，大炮 300 门，各种弹药 1000 多万发，预做武装叛乱的准备。

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当天，他们便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各地，重大问题要向他们汇报，妄图切断党中央与各省、市、自治区的联系，由他们来发号施令。就在同一天，“闻名全国”的“白卷先生”张铁生就像酒后自白一样露骨地说：

现在，我们的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

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我给党中央和人大写过信，没想到主席去世这么早。他在计委会上讲话，与洪文的讲话就不一样，不能说绝然不同，但起码有差别。

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

华的讲话对右的人是个鼓舞。有的省有人来信说，他们全省传达，而不是内部传达，反响很大，二老爷很猖狂。他可是国家的一把手了。

1976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社论。“社论”写道：

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发展，革命事业就胜利；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遭受挫折，革命事业就失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记住这个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走资派作斗争。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我们按毛主席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从 9 月 22 日起 到 9 月 30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每日都刊登一条毛主席语录：“按既定方针办”。其中 24、25 日加了“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几个字，26、27 日加了“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几个字，28 日加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几个字，29 日增加了“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这样最为露骨的字样。

就在“四人帮”手忙脚乱地急于抢班夺权的时候，“四人帮”的爪牙们也跟着开始四处活动起来，一次又一次地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张春桥写了篡党夺权的提纲，准备镇压和杀害

一批反对“四人帮”的干部和群众。9月16日“四人帮”精心策划，推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社论，第一次抛出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并叫嚣“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深入开展下去。”

一进10月，“四人帮”抢班夺权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并且渐露杀机。姚文元露骨地叫嚷：“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毕竟不是绣花”。王洪文叫嚷：“在上海找一百条狗困难，捉1万个、10万个反革命容易”。“四人帮”已准备好了告人民书，准备政变后就立即向全世界发布，他们依仗上海和北京的民兵武装这个后盾，开始了政治舞台上最后一场大夺权的丑恶表演。10月1日，江青跑到清华大学，污蔑邓小平“迫害毛主席”，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并发誓“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下去”。10月2日，王洪文私自拍“标准像”，为上台做准备。他一下子让摄影师为他照了穿便服、穿军装的标准像、办公像114张，又从27张8英寸样片中亲自选定了他满意的标准像，恬不知耻地指令按周总理标准像的样子进行修版。10月3日，王洪文跑到平谷县煽风点火，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还肯定地说：“建国以来，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影射、攻击华国锋、叶剑英等人是修正主义。也在这一天，毫无哀伤之色的江青跑到景山公园，临行前，她命令手下人和她一起念了几条毛主席语录，而后就歇斯底里地大骂“邓小平是反革命，万里是坏人”，还说“中央领导人的排列顺序要按主席规定的排列，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谁也不能反对，反对他们就是反对毛主席”。平常一向穿戴妖里妖气，又怕光又怕风的江青，这次却摘掉了帽子，也没戴围巾，又没挎小皮包，而是换上了中山服，在苹果树前搔首弄姿，让摄影

师一下子照了 17 张标准像。然后又兴致勃勃地到北海仿膳斋用餐，边吃边骂：“阶级敌人造我的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同日深夜，“四人帮”的干将迟群，催促“梁效”写作班子加快整理有关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的黑材料。他的秘书得意洋洋地说：“主席、委员长、总理就要定下来了，要提升一批。”

10 月 4 日，“四人帮”以梁效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公然发出了篡党夺权的信号，气势汹汹地声称：“任何修正主义分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没有好下场的”。“四人帮”之所以把毛主席生前“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并称之为“临终嘱咐”，是想利用这一“尚方宝剑”来扫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以达到他们向权力顶层爬行的最终目的。为此，姚文元多次打电话或口头指示新华社，强调要反复宣传这一所谓“临终嘱咐”，不要怕重复，于是各种报刊都连珠炮似地发表文章，为此大吹大擂。截至 9 月 30 日，据不完全统计，只 6 种主要报刊就登载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各种专文 236 篇，占全部发表追悼毛主席的报道和文章的 59%。许多报纸把“按既定方针办”用做通栏大标题，有的为此登大幅宣传画，大肆宣扬，反复说明“按既定方针办”就是“坚持与走资派斗争”，就是“坚持学习，深入批邓”，也就是按照“四人帮”的方针办。

华国锋很快察觉这一阴谋，在 10 月 2 日的一个批示中指出，毛主席亲笔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避免错传，他将毛主席的亲笔原件拿出来加以核对，确认其中有误后便删去了“按既定方针办”几个字。这可激怒了“四人帮”，张春桥出面阻止传达华国锋的批示，江青则亲自出马找经典，找根据，于是才有了 10 月 9 日的文章。这是一篇反革命的宣言书，它像一股罪恶的龙卷风，刮遍华夏大地，饱受十年之苦的人民，又一次遭到恐怖的袭击。素

有政治头脑的千百万干部、群众，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恶贯满盈的“四人帮”早已天怒人怨，如今，他们已在霍霍磨刀准备夺权：江青到处抛头露面，大讲“女皇帝”；姚文元关起门来和他手下的文痞子们炮制各种“诏文”；张春桥、王洪文则忙着打电话、发号施令，调兵遣将；“民兵指挥部”在昼夜值班。“四人帮”还到处放风，说10月8、9、10日将有“特大喜讯”，为作喜庆准备，上海的一些商店中，鞭炮、红纸竟被抢购一空。

在这紧急关头，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凭借多年的斗争经验，凭着对党和祖国的一片赤诚，敏锐地观察着“四人帮”的举动，关注着国家的前途，为此他们还多次碰头，研究对策。

还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王震就多次到叶帅处秘谈。提到王、张、江、姚时，王震说：“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叶剑英则认为，主席还在世，不可轻举妄动，要等待时机，并要王震和中央办公厅主任、主管中央警卫部队的汪东兴保持联系。王震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他愿做老师的联络参谋。

在毛泽东病危期间，肖劲光也曾到叶剑英处商谈过此事：

说得想个办法把江青、张春桥搞掉，不然毛主席身后让他们掌了权，党和国家就糟了，并建议下令调集军队，采取分割围歼的办法，把江青、张春桥等抓起。叶剑英深思良久，摆了摆手说：主席病重，现在还不是时机。<sup>①</sup>

对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问题，聂荣臻元帅也忧心如焚。9月21日，他通过总参谋长杨成武转告叶剑英：

<sup>①</sup> 《肖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第351～352页。

“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毛泽东治丧期间，邓小平、陈云、聂荣臻、李先念、邓颖超等人都曾找有关人员商量过“四人帮”的问题，并直接找过叶剑英。经过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多次商谈，叶帅心里有了底。但对于这个问题，叶帅感到这不应是别人的行动，对于这样的一场斗争还应注意它的合法性。于是，他便就此问题去征寻华国锋的意见。

此时的华国锋正因“四人帮”的纠缠而苦恼。自从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就紧锣密鼓地为篡党夺权做准备，对于这一点，华国锋也看得一清二楚。9月29日，江青等人再次大闹政治局会议，公开要求为江青安排工作，目的就是想让她当党中央主席。接着就是在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上又哭又吵。这些激烈的争吵，无理纠缠，搞得华国锋忍无可忍。对于“四人帮”的这种恶劣行径，华国锋也感到以正常途径难以解决。因此，华国锋与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在处理“四人帮”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经过协商决定采取特殊方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这是一场在非常形势下以特殊方式进行的斗争，为了确保胜利，叶帅等人反复磋商，周密部署，对每一个细节都不肯有丝毫的含糊，同时，还和军队的有关领导人取得联系，掌握好总部机关，陆空军和沿海边防。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 1984年版，第867页。

10月6日晚7时，叶帅的车子驶进了中南海怀仁堂，华国锋、汪东兴已等候在这里。正厅由一扇屏风一分为二，华国锋和叶剑英分别坐在沙发上，汪东兴和警卫则在屏风背后。当时针指向8点时，命运之神开了个玩笑，最先到的竟是号称神机妙算的张春桥。可惜这次他没算出自己的命运会由此发生变化。他夹着文件包，兴冲冲地走来，一进门，随身警卫被留在了外边，他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头，忙接连不停地问：“怎么回事？”进到屋里，叶帅正襟而坐，目光严峻，华国锋立起身来，严肃地代表党中央向他宣布，你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你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平时盛气凌人的狗头军师，此时双腿打颤，只是用手摸了摸眼镜，没有任何反抗，就由监护人员带走了。

接踵而至的是王洪文，这个号称“文武全才”的大人物，走下高级轿车，趾高气扬地跨进门来，行动组的一位负责人带着几个卫士走进来，王洪文一看势头不对，立刻端起中央副主席的架子来，厉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接着就使出造反派司令的看家本领，拳打脚踢，尽管他武斗还有一套，但还是很很快就被扭住双手带到正厅。他看到坐在那里的华国锋、叶剑英，预感到大事不妙，于是像野兽一样扑了过去，警卫人员将他推倒在地，等他爬起来从青云直上的梦境中清醒过来时，已是威风全无，乖乖地听从华国锋宣布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的决定。被带走时，无奈地发出叹息：“没想到这样快”后悔已来不及了。这倒证明了一条真理，对付他们采取“先发制人，以快打慢”的方针是何等的及时，何等的正确！

姚文元姗姗来迟，8时15分才到。其实，姚文元早就想来开政治局常委会了，“四人帮”这位笔杆子已心痒多时。他接到通知，嘴里还唠叨着：“搞什么鬼！这么长时间不开会，早就该开这个会了！”心里急着来参加会议，竟忘了带帽子遮上秃头，也忘了叫警卫，只顾夹上皮包匆匆来到中南海。不知是因他迟到还是其他什

么原因，对他的处置已开始降格，没让他进正厅，只在东廊的大休息室里待命；华国锋也没有亲自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而是由中央警卫局一位副科长宣布。等姚文元弄清楚怎么回事后，这个昔日的“金棍子”，“四人帮”的吹鼓手、平时一贯善于用“软刀子”杀人的凶手，此刻双腿一软，瘫倒在地，被几名卫士拉起来，踉踉跄跄地被带走了。

就在怀仁堂的“会议”紧张进行时，另一个小组来到了中南海万字廊 201 号，有一点不同的是，这个小组有两名女警卫。居住在这里的“女皇”，这几天为筹备“登基”真是又忙碌又兴奋，实在太疲倦了，此刻刚吃完晚饭，正在沙发上休息，沉浸在美妙的女皇梦境之中。据执行这一任务的中央警卫团长张耀祠回忆，他当时带人进去后，因为是熟人，平时常见面，江青只是点了点头，仍在沙发上端坐。但今日非比往常，张耀祠站定，庄重、严肃地宣布：“江青（没往常的‘同志’二字，江青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按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除了“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他临时加上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江青似乎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她在沙发上又坐了一会儿，才慢慢站起来，从腰间摘下钥匙，密封进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上了“华国锋同志亲启”7 个字，交给了张耀祠。之后，被人押上了她平时乘坐的专用轿车，并没像传闻那样戴手铐。这一天，把她带到了中南海的一间地下室。

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中央，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打垮了“四人帮”。当晚，玉泉山 9 号楼叶帅住处的会议室灯火通明，从晚 10 点一直到第二天早晨 5 点，中央政治局会议一直在这里进行。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与会者听了华、叶的报告，无不

欢欣鼓舞，完全赞同这一行动。

从第二天开始，“四人帮”在各地的爪牙也相继被隔离审查。4年后，林彪、江青集团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江青、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1年5月14日，保外就医的江青死在她的住所，1992年8月3日，王洪文因病死在医院。

“四人帮”的罪行有目共睹，“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就达34000多人，受迫害的达70万人，受株连的有1亿多人。“文革”期间的经济损失高达5000多亿人民币，中国真是元气大伤。多行不义必自毙，任何倒行逆施，与人民为敌的人，最终都绝无好下场。粉碎“四人帮”，人民欣喜若狂，多灾多难的中国，在1976年终于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

金秋10月，当人们渐渐从悲痛中缓过劲来的时候，陡然间又迎来了粉碎“四人帮”这一特大喜讯。于是又载歌载舞开始庆祝这一伟大胜利。就连叶帅那样一个饱经沧桑，屡历悲欢的老革命家都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时过一年之后，他在给外地的小女儿的信中还这样写道：“十月六日，又看戏，又吃螃蟹，吃了三只公的，一只母的，作为纪念胜利。”可见时隔一年之久喜悦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粉碎“四人帮”，人们在大喜之余却仍心怀隐忧。“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究竟应向何处去？社会秩序的混乱状态还没有被理顺，经济状况已濒临崩溃的边缘，面对此种局势应怎样调整？阶级斗争的老路是否从此不再走？这一连串的问号需要人们作出回答，尤其是需要新的中央最高决策层作出回答。

十几年的“左”给人们留下苦涩的记忆。粉碎“四人帮”后人们仍然心有余悸。“文革”结束16年之后，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还心情沉重地说：“‘左’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就

让它搞掉了。”

“左”给人们留下的教训的确太沉痛了。民主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每一次都无不使革命付出惨痛的代价。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左”又像一个摆脱不掉的恶魔缠绕我们多年，我们付出的学费实在是太昂贵了。

## 二、“三面红旗”的狂风暴雨

要想深刻地认识具有“十年”严重影响的极“左”根源，就必须从八大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谈起。1956年党的八大确定了积极稳妥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这个方针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本来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方针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较为健康地向前发展。然而，这一方针却没有能够得到切实执行，不久就被以急躁冒进为特征的“大跃进”所取代。

当然，若追溯急躁冒进思想的源头，那还要探讨一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我国产生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它在我国也有一个较长时期的酝酿过程。建国以后，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在建设方面基本上是沿袭苏联的做法，但毛泽东不久就发现这种做法存在不少弊端，于是便力求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应该说，这种思想本身是可取的，不过在怎样去探寻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却存在某种不可取的东西。由于建国以后，我国各个方面的工作进展都比较顺利，这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似乎“应该比苏联搞得快一些、好一些，应该以尽可能高的速度向前发展”。于是，毛泽东便加紧了这方面的探索，先后作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构想和重大方

针政策。不过，这里应该加以说明的是，毛泽东这时的探索主要是围绕着如何把建设搞得快一些和好一些而展开的。早在 1955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中就提出：“要讲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在这里首次提出了“多快好”的思想。不久，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要“又多又快又好”，在这里，便把社会主义建设与“多快好”结合起来了。同年 12 月，毛泽东在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中再一次提到社会主义建设与“多快好”的问题。他说：“中国农民比英国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后，采纳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的后面又加上了一个“省”字。12 月 14 日，薄一波在全国农具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改善企业管理，掌握新技术，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提高我国重工业的生产而奋斗》的报告中，首次将“多快好省”作为中央的建设方针加以传达。1956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在《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中，把“多快好省”作为口号向全国发表了。

继此之后，1957 年 12 月 12 日和 1958 年元旦，《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和《乘风破浪》两篇社论，社论在进一步阐述“多快好省”思想的同时，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这一口号提出后，便受到毛泽东的赞赏，于是在 1958 年 3 月的成都会议上，则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与“多快好省”联系起来，称之为总路线。关于这条总路线，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里论述它的形成过程时讲到：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问题（即快一些、好一些的方法和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笔者），在 1958 年正式形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

线。

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多快好省，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开始。1956年的跃进，出来了一个反冒进，经过了一次曲折。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恢复多快好省。1958年春，南宁、成都会议上批判反冒进，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5月党的八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总路线。

从这条总路线的酝酿过程来看，它始终是与速度问题相伴而生的。在总路线酝酿的初始阶段就曾在建设速度问题上产生了“冒进”与“反冒进”的分歧。尔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经历了一段“反冒进”之后，在“批判反冒进”的气氛中形成，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含有某种“急性”成份。八大二次会议的党中央工作报告便是这一“急性”思想的有力说明。报告中说，我国已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在这个伟大时期里，“建设速度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主要问题”。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在《力争高速度》的社论中写道：“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并画龙点睛地指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不仅如此，社论还从政治的高度，强调“速度问题是建设路线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方针问题”，所有这些，核心都是在强调“速度”问题。诚然，在我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特定条件下，我们强调发展速度问题是无可厚非的，但关键是我们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速度。而在当时我们追求的却是不顾客观条件的高速度。“就是要跟先进看齐”，并且这种看齐“在国内无非是争‘四五八’（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的12年内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地区粮食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亩产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

以南地区亩产达到 800 斤——笔者)跟国外比较 就是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 7 年赶上英国, 15 年赶上美国。’这样 总路线所倡导的速度也就变成了为赶超战略服务的速度了。

诚然, 急切赶超并非中国的特产, 它具有世界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一些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 痛感饱受列强凌辱之苦, 于是发奋图强, 急切赶超发达国家就成了它们普遍的强烈愿望, 在这个行列中中国也不例外。

正当这些刚刚独立的民族国家发奋图强, 急起直追之际, 又迎来了 1956 年苏联十月革命 40 周年大庆。有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和 64 个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云集莫斯科, 满怀着庆祝十月革命胜利的喜悦参加本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发表了一个著名的《和平宣言》, 《宣言》中豪迈地申明: “让社会主义制度不同的国家今后在发展和平科学、和平技术方面彼此展开竞赛吧。让它们不是在战场上, 而是在争取进步, 争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竞赛中来证实自己的优越吧。”这对于社会主义各国, 无疑既是巨大的压力, 更是严峻的挑战。

莫斯科会议, 像一股无形的引力, 驱使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开始重新思考本国的发展问题。赫鲁晓夫以一个大国领袖的派头, 首先贸然提出苏联在工业生产上 15 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赫鲁晓夫这一急于赶超的思想犹如一支“兴奋剂”, 立即荡起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快速发展的急性心潮。本来,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作总结报告时的设想是: “大约 10 年左右, 即三个五年计划左右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 还要再加一点, 大约 50—70 年左右, 即 10 个到 15 个五年计划左右可以赶上或超过英国”。这时, 毛泽东感到, 这个设想已经不足以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雄心壮志了, 于是修改了这个时间表。11 月 6 日,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 40 周年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把苏共二十大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奋斗纲领”作为一个成功的经验加以肯定。并

于 11 月 8 日，在与法国共产党领袖多列士谈话时还豪迈地提出：“15 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的“二哥”不能比“老大哥”落得太远的自豪感。没想到这种不甘人后的冲动，喊出的是豪情，带来的却是被动。

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之后，赶超气氛弥漫于全球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朝鲜全面展开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千里马”运动。东欧各国掀起了如火如荼的生产劳动竞赛。正是在这种气氛下，中国“大跃进”的战鼓也轰然敲响。

在赶超气氛下，需要有跃进的舆论作为号角，反冒进自然也成了不和谐音。

1957 年 9、10 月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提出了批评。反冒进本来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措施，但毛泽东却把它当作错误的东西加以批判。

1953 年以后，我国大规模有计划地开展经济建设以来，经济战线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使得党的一些领导人有些头脑发热了。1955 年 11 月，毛泽东离京去杭州，在沿途听取汇报时，被其中的急躁情绪所感染。随后，便在他主持制订的《农业 17 条》和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都有所反映。认为“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适当地扩大和加快”。这种思想使头脑发热的人又进一步受到鼓舞，于是各地便争先恐后地提出高指标，扩大建设规模，以期做出更大的成绩，结果并未能事遂人愿，使得 1956 年的经济建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贪多求快、急躁冒进的毛病。对此，主持第一线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同志便提出了反冒进的措施。刘少奇还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事实上，这一措施取得较好效果，使 1957 年成为经济工作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然而，经济效果和经

济速度二者之间并不是同向度的，而注重经济效果却使经济速度有所降低，这就与快速发展的思想发生了矛盾。于是，毛泽东便对反冒进提出批评。

1957年9至10月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一改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分析，重提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并错误地认为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右倾保守，甚至还把1956年正确开展的反冒进当做右倾保守来批判，从而助长了“左”倾冒进思想。会上提出争取能够走出一条比苏联的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的建设道路的设想，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认可，这样，八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就成了大跃进的发端。

1957年10月27日，毛泽东出访莫斯科期间签发的《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的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社论在社会上公开提出了反反冒进，《社论》说：“1956年秋后刮起一阵邪风，放松甚至放弃四十条纲要目标，结果是消极因素上升，右倾思想抬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明确赞扬1956年是正确的跃进，而不是冒进，批评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号召“在生产战线上来个大跃进”。这篇社论顺乎了赶超潮流的形势，毛泽东对其大加赞扬，说“读起来有味”“其功不在禹下”。还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自1958年1月南宁会议起，毛泽东便接二连三地对1956年以来的反冒进提出严厉批判。说反冒进是政治问题，反冒进泄了6亿人民的气，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只能反右倾保守。还提出了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的观点。同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对1956年反冒进的政策作出了否定性结论，会上，主持反冒进工作的主

要负责同志都分别作了检讨。错误地批判反冒进，其结果在思想上，批掉了实事求是，客观上肯定了“左”的思想方法；在政治上，批掉了八大的正确路线，代之以高速度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组织上，滋长了个人专断，党内民主作风和集体领导原则受到了严重冲击；在经济工作上，批掉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肯定了急躁冒进和“大跃进”的合理性。

任何一种运动都以思想理论为先导，有了思想理论先导，实践就会随之发生。

“大跃进”由农业率先发起。八届三中全会在批判反冒进的同时，恢复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随之又作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要求各地鼓起像1955年冬季高潮中那样一股劲头来，使这一运动“成为随着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高潮而来的生产高潮的主要组成部分”。《纲要》和《决定》发出后，各省、市、自治区便立即行动起来，相继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武器鸣锣开道，部署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落实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敲响了“大跃进”的战鼓。这场运动神州处处摆战场，真有如规模空前的大战争，人喊马嘶热火朝天。劳动力投入也大得惊人。1957年10月，二三十万人，11月份六七千万人，12月份达八千万人，1958年1月高达一亿人。有1/6的人口投入了这场运动。在这种运动热潮的冲动下，领导人激动了、人民群众也激动了。

“大跃进”运动之所以轰轰烈烈地掀起，有两条方法从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一条是《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规定的三本账的计划编制方法。“六十条”中这样写道：“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第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